



「音乐家叶聪（左起）、作家拉迪夫·莫哈末和戏剧家王爱仁获得今年的「新加坡文化奖」。也让我们循着花香溯源窥探，聆听他们的故事，认识他们的执着，一起找回那无价的初衷。在这个属于文化人的季节，除了以奖项表彰文化人的贡献，新加坡华乐团音乐总监叶聪、马来作家拉迪夫·莫哈末、野米剧场艺术总监王爱仁。今年，我国文化人的最高荣誉「新加坡文化奖」，颁给了三位艺术家和作家。而人群中总有辛勤的拓荒者，为有限的时空，拓展无穷的文化艺术瑰宝。一个国家的文化形成，靠的是一代代代人的生活积累。国家有魂，文化无疆。」

文化奖三剑客： 得奖是故事的开始

2013年新加坡文化奖和青年艺术奖专辑

陈宇昕 王一鸣 邓华贵 / 报道
唐家鸿 / 摄影

叶聪： 今后每一步要跨得更远

对新科国家文化奖得主叶聪来说，获得文化奖肯定，只是故事的开始。

今年63岁的叶聪11年前受委担任新加坡华乐团音乐总监，展开他与新加坡的缘分。他接受专访时谦虚地说，获奖是对他与新加坡华乐团整个团队的肯定，“特别是我可爱的乐队，我只是在台上指挥节拍，是他们奏出了音乐。”

对于当年来到新加坡发展的决定，叶聪说，当时他无论在音乐或是领导能力上，都已经达到生命中最成熟的阶段，如今来看，他觉得奉献对了，因为新加坡给了他欧美所没有的平台。

回顾自己在新加坡的时光，他说，所有成就当中最重要的一条，是乐团闯出了新加坡的特色。

叶聪接掌乐团后积极推动“南洋风”，虽然开始时惹来不少冷言冷语，但华乐团成功开出国门之花，更得到观众、国家，甚至国际乐坛的认可。乐团甚至成为首支受邀参与爱丁堡音乐节的华乐团。

他说：“我心中有个信念，无论任何中西乐团，当你在某个国家，你一定要跟那里的民俗、文化、水果、天气、语言有所联系。我不光是帮华乐团做这种事情，我在美国的乐团也大量表演美国本土的乐曲。之前在香港澳然，我在新加坡提出南洋风不是偶然。”

推广南洋风华乐海阔天空

叶聪初到新加坡时，一次无意中走入一个画廊，深深被展品吸引。当时展出的是刘抗等南洋画派画家的作品，他便想，“既有南洋画派，为何不能有南洋乐派？”

他形容推广南洋风的过程，是从投石问路，到一石激起千层浪，到现在的海阔天空。

2006年与2010年举办的华乐作曲大赛，累积了许多优秀作品，培养出一批新锐作曲家。但叶聪认为，南洋风的曲目，需要至少一代人的时间积累，就像西方用了数百年才积累出一个时代的风格与作品。“这不是向机器投币买饮料，这只是故事的开始，在这条路上，我们任重道远。可喜的是，已形成一批醉心于写作这类乐曲的作曲家，乐团也有了自己的风格。”

他说，既然南洋风是新加坡乐团独有的，就必须当仁不让，演得比别人好，维持自己的品牌。

叶聪也身兼美国南湾交响乐团的指挥，必须两地奔走，他形容自己是“海陆军战队”，虽然身体疲惫，但乐此不疲，因为在华乐与交响乐的交融作业中彼此刺激，让他时时感觉新鲜，激发创意，感觉年轻。

他不希望获奖成为包袱，但知道压力是必然，因此必须把压力化为动力，未来绝对不会固步自封，不能停止革新，而且每一步要跨得更大更远。

出生于上海的他，5岁学琴，1979年在上海音乐学院攻读指挥，1981年远赴纽约曼哈顿音乐学院深造，1983年进入耶鲁大学修读音乐硕士，先后师从梅荷、鲁道夫、史勒曼及薛林。

叶聪目前是新加坡永久居民，他说，他和妻子一直在考虑在新加坡居住。当问及是否考虑成为新加坡公民时，他回答说：“为什么不呢？”

拉迪夫·莫哈末： 40余年未停止书写

63岁的马来作家拉迪夫·莫哈末（Mohamed Latiff Mohamed）第一次发表文学创作，是16岁时在校刊上刊登了一首诗。“那是1966年，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才一年，我产生了很强烈的情感波动，所以就诉诸于文字，写成了诗。”拉迪夫说。

他接着说：“我还记得小时候，老师在课堂上说过‘如果人生在世对社会毫无贡献，那死后没有人会记得你’，年少时我便开始思考，要怎样才对社会做出贡献。”

写下那首诗后，他才意识到写作就是自己的贡献。从16岁时拾起笔，他就从没有停止书写，在文坛活跃了40多年，他自豪地认为获得文化奖，是对自己文学生涯的巨大鼓励，当然也是“为写作而生”的一个光辉印证。因为写作，他听到了自己心底的声音，掌握了与历史、社会对话的工具。

“新加坡独立”带给拉迪夫的触动很大，他认为这对新加坡的马来族群产生了很大影响，他的诗歌、故事和小说等诸多创作均以此为主题，反映独立前后马来族群在新加坡的挣扎经历和生活感受，包括他即将在作家节发表的新作“Confrontation”，便以一个马来青年的眼光看待独立前的新加坡社会，该作现已译成英文版。不仅题材触及较为敏感的族群议题，这三位荣获“新加坡文学奖”肯定的作家，写作风格亦被赞为激进、坦诚，并带有极其浓厚的新加坡在地色彩。

拉迪夫受访时说：“我始终认为新马分家对马来族群来说是巨大损失，很多人因为我总是将这个当作创作主题，并且写作手法尖锐，而把我称为‘种族主义者’，我想我只不过是试图反映马来族群在那个特殊时代的状况。”固然也有其他作家书写独立初期社会风貌，拉迪夫认为比起一些得奖作品，自己的不同之处在于“微观”书写，来讲述普通人的境遇和心理，借此还原真相和现实。

“母语写作”在新加坡并不乐观

作为资深马来作家，拉迪夫也关注新一代马来作家的培养。18岁即加入“马来文学团体”50年代作家行列（Angkatan Sasterawan 50，简称ASAS50），现在是团体的副主席。该团体长期为年轻马来作家提供导师。面对目前马来年轻作家的素质，拉迪夫提出了担忧：“我们这一代作家有切实的社会体验和凝练的群体情感，以及较强的荣誉感，这些都是年轻作家欠缺的，更重要的是，若不具备‘写作者的灵魂’，无法把全部激情投射在写作中，是不可能成为优秀作家的。”当然一切还是得回到“母语写作”的根本问题，他直指“母语写作”的现状在新加坡并不乐观：“尽管年轻人接受的教育比我们高等，获取的知识丰富，并不代表对母语有更好更深的掌握，很多青少年接触母语文学纯粹为应付考试，本身对母语没感情，何谈写作？”此外，新加坡的马来文学此刻又有多少读者群体和国际知名度？

拉迪夫表示，新加坡的马来文学几十年来有一定发展，但在国际上并不算有一席之地。反观毗邻的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，马来文学却有相当大影响力，因为作家在国内有热爱的读者和专业的书评。拉迪夫的作品也在马来西亚和印尼受到欢迎。

不过，文艺会近年致力于举办全国性文学活动和写作项目，显示了来自官方的支持。当然，应继续与本土作者保持密切联系，提供创作和出版过程所需的帮助，并尽可能将他们的作品译成英文版本，以便在国内和国外宣传。”

王爱仁： 我什么都没有放弃

“我什么都没有放弃”——简短的一句话，道出王爱仁（Ivan Heng，50岁）20多年的戏剧人生，也涵盖他对剧场艺术工作的执着与信念。

王爱仁是本地知名剧场工作者，英语剧团野米剧场的创办人和艺术总监。1996年，他获颁艺委会的青年艺术奖，一年后决定结束在海外的演艺生活，把工作基地转回新加坡。

他说：“你问我这些年来如何维持对剧场的热爱，其实很简单，做戏剧就是我的使命，是我毕生的热忱。我从来没当过律师，也未想过要当律师，更不认为选择不当律师，就等于放弃了些什么。”

为了追求热忱，王爱仁在1990年毅然跑到苏格拉皇家戏剧学院进修表演三年。以优异成绩毕业后，他前往伦敦，开始在电影、电视和广播方面的演艺生活，并在英国创立“行者剧团”（Tritipitaka Theatre）。1996年，他获颁艺委会的青年艺术奖，一年后决定结束在海外的演艺生活，把工作基地转回新加坡。

2000年，王爱仁创办野米剧场，提拔许多新秀人才如亚非言和林志坚等，更以许多娱乐性强、制作精緻大胆的演出，大大推动了本地戏剧的专业化和商业化。

他自豪地指出：“目前为止，已有超过75万人看过野米剧场的作品。我做戏剧的动力就来自于亲眼目睹艺术是如何改变人生，让人们敞开心扉，以及开阔视野。”

在本地，剧场艺术能给社会带来非同凡响的影响，这在其他国家是相当罕见的。外国朋友每次来看我们的演出，都会观察说：新加坡剧场充满活力，你们的观众渴望看到更多。的确，我们不是在模仿百老汇，我们的演员只是尽情地在舞台上活出自我。”

戏剧不只是在舞台上演的戏码

谈到获奖心情，王爱仁先是哈哈大笑说：“很惊讶，你也知道我是剧场的‘坏小孩’嘛。所以这次获奖，有点受宠若惊的感觉。”不过他马上又认真地说：“毕竟这是我国艺术界最高荣誉的奖项，能够得奖真的很开心，感觉多年来的努力受到认可，也是一种鼓励。”

他也透露，野米剧场将从明年1月起在市区重建局的社区和体育设施计划（Community/Sports Facilities Scheme）下，搬离目前于小印度的两间工作室，迁入位于加冷娱乐广场的崭新空间。届时，剧团也将终于拥有自己的黑箱剧场，这将是王爱仁期盼已久的。

提到未来几年的大计，王爱仁表示将再次开启野米剧场青年支部“青春狂野”（Young and Wild）的运作，以及继续呈现能令本地社群产生共鸣的剧作。

他说：“我曾到过许多国家如日本、加拿大、韩国等，观察当地的剧场生态，发现一些地方如首尔的剧团能经常吸引上万名观众入场。野米剧场也不落人后，将重心放在提供大众化、不过于昂贵的剧场表演，让大小市民都能来看戏。”

“剧场的奇妙之处在于，开场前，观众彼此之间都是陌生人；戏落幕后，大家却因观赏了同一部剧，有了共同经历而成为一个社群。所以说，戏剧不只是在舞台上演的戏码，它的魔力也延伸至剧场的每一个角落。”这也是王爱仁对剧场艺术如此着迷的原因。